



中国门

[美]威廉·阿诺德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中 国 门

4136

〔美〕威廉·阿诺德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001号

中 国 门

〔美〕威廉·阿诺德 著

杨波 方岩 黄锦章 沈煜民 沈康 等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宝鸡市人民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5印张 256页 319千字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224-01216-5/I·254

定价：7.05元

作者致辭

除了一些明显的史实和参考资料外，本书纯属虚构，没有“中国门”，没有威廉·布赖恩·怀特，也没有欧米加·凯集团。60年代初台湾美国人学校是有过那么一个欧米加·凯学生联谊会，但它决非本书描写的那个组织的原型。我用它的名字，只是出于我个人的某种情感记忆，如此而已。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卷 (1961—1964)	(6)
第二卷 (1965—1970)	(162)
第三卷 (1971—1979)	(313)
译后记.....	(471)

引子

1949年11月6日，一个凉爽、明净、寂静得有些反常的早晨，一个男人领着他5岁的儿子站在“南中国海”号客轮的主甲板上，注视着那群逃难者顺着软梯爬到在水面上沉浮不定的登陆艇里。登陆艇将把他们运到基隆港。

这次从中国大陆的撤离，今年中期以来就开始昼夜不停地进行着。几万名逃难者乘坐飞机、货船、帆船、救生艇或者小舢舨横渡台湾海峡，仓皇躲避乘胜追击的共产党军队。一个星期之内，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将成为过眼烟云，所有这些人都面临新的生活的考验。

甲板上看着他们的是个美国人，他颓然地意识到，自己也不得不重新开始生活，但他不知道怎样开始。

这个人名叫怀特，在过去的30年间，他作为上海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大班，是美国商业寡头的杰出领袖之一，一直支持蒋介石和国民党人，直到这样一个落魄的结局。中国国内战争的最后这几年对他来说是可怕的磨难，他枯槁的面容和皱巴巴的衣服显示了这一点。无论从哪方面讲，他都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父子俩凝神观望这些景象的时候，一个英俊的中国青年

面色凝重威严，疾步走到他们身边，静静地站了片刻。他过来时，甲板上的苦力们都退避一边，鞠躬行礼，显然，他是个令人敬畏的人，身上甚至有种令人恐惧的东西。

这人名叫金路，他确乎是个令人畏惧的人物。从广东到大连，无人不晓他是青帮的当然继承人。至少到这个星期为止，青帮，这个中国最有权势的黑社会组织，一直控制着中国的城市经济和遍布全球的海外华人团体。他是东方人所说的那种强盗，虽然在汉语里，这个称呼没有英语里的那种邪恶的含义。像甲板上的其他人一样，他也开始面对新的生活。

金路挽着怀特的胳膊，带着孩子，走到船尾，登上他的专用快艇。他们一道攀上绳梯，水手长开动快艇马达，船载着他们直驶港口。

一驶离大船，金路就指着前面一片山峦起伏的陆地，用纯正的英语说道：“台湾……意思是一个梯台形的海湾。葡萄牙水手叫它‘福摩萨’，就是美丽的海岛之意。在中国历史上，它一直是流浪者、海盗、革命者、政治流放犯的避难所。对我们来说，它也是个理想的庇护所，共匪要花许多年，建成一支强大的海军，才能来进攻它。”

美国人一言不发，只是呆视着远处，在他身旁，孩子趴在船舷上，让水沫飞溅到他张开的手掌上。

小船驰向倾圮的码头，那里聚满了苦力和国民党士兵。金路带着父子俩下船，一边用中国话命令水手长等他。

“你不留在这儿吗？”美国人好像才回过神来，好奇地问道。

“我要去香港，我的主人杜月笙快要死了，我必须呆在

他身边。^

美国人的脸上掠过一丝惶恐：“我们现在该做什么？”

“我们现在的事情就是把从我们手中拿走的东西再夺回来。”他用力地回答道，满怀信心，丝毫没有受到周围乌云般笼罩着的失败情绪的影响。

“难道我们还能希望……？”

“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要从这个海岛开始——正像你以前说过我们应该做的那样。也许不会很快，但一定要在我们的有生之年。”

怀特再次茫然地将视线移向远方，“我们无路可走。”他说。

“不，有的，你的儿子会替我们找到道路的。”

“我的儿子？”

那孩子有双大而迷人的灰眼睛，特别引人注目。当他意识到大人们在说他时，变得有点不自然了。他试图想听懂他们的谈话，在他显然有些虚弱的父亲面前竭力摆出一副坚强的样子。

“陈抟这么说的。”

“陈抟？那个算命的？”

“是的。”

伟大的陈抟是现代中国享誉最高的占卜者、预言家。几个星期前，就在上海快要陷落时，金路来到他床前听他作最后一次预言。这个著名的道教徒已年逾百岁，积年多病，行将就木。当金站在他面前时，他入定沉思，犹如阴魂附体，然后仿佛忽然心有所悟，惊醒过来，求签问卦，又花了一整天时间遍览旧籍，以确证神启。

“你信吗？”

“我必须相信。”金的回答有些窘迫。他不是个非常迷信的人。他在教会学校受过教育，接受了许多西方人看待世界的方法。但是，他不想怀疑这个上通千年历史的道教玄学的预言家神秘的临终预言。陈抟得出的结论不会错的，绝对不会的。

美国人眨眨眼，竭力想弄懂他话里的意思。他掉转视线，看着另一只满载逃难者的船停靠码头。

“陈抟说了，中国确实会落入强盗之手，但不出30年就会光复。这得靠您的儿子。他是救世主，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救星。总有一天，他会领导我们，把中国从征服大陆的邪恶的外国哲学思想那里夺回来。”

美国人好像对那艘停靠着的船特别感兴趣，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它，对金路的话置若罔闻。

金路继续说下去，思绪回到他在大预言家床边的那个重要的时刻。“这个孩子将在台湾长大。当他获得足够的男子气时——确切地说，当他充分显示出男子汉的刚强勇毅时——他将踏上一个伟大的征途。途中他会经受各种艰难困苦，甚至磨难，来考验他坚忍不拔的意志——在这儿，也在他自己的国家。但他会百折不挠的，许多年后的某一天，他会成为整个岛屿的霸主。雄踞此位后，他将发动战争，把中国拉回到历史的正轨上来。这就是这个孩子的使命——而我们这些人的使命就是帮助他。”

金路停住话头，使情绪缓和下来。但他发现，怀特显然并不在注意听他的。金路明白，再说下去也没用，他淡淡地看了他一会儿，然后拥抱了他。他走近孩子，把他抱过来。

吻了吻他。

金路把手伸进衣袋，掏出一个带有金链条的六边形护身符，挂在孩子脖颈上。“永远带着它，”他柔声说道。“它是我的族徽。”

尽管小孩点点头，微笑着，但他实际上并不明白所发生的这一切。他不懂这个大人在干什么，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这样无动于衷，不知道自从那次大轰炸后妈妈上哪儿去了，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得不离开原来的家。

他紧紧牵着父亲的手，望着那人回到汽艇，驶向大船，他不会想到，自己在这个岛上居留期间将会受到青帮有力的庇护。

第一卷

(1961—1964)

.....[.....]

沃伦·希尔维亚·斯蒂文斯，美国亚洲司副司长，仰面靠在他那巨大豪华型肯得拉克轿车后座上，忧心忡忡。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正碰上一个很大的麻烦，这甚至是他从前没有想到过的。

斯蒂文斯身材魁梧，是个林肯式的人物。50年的外交生涯中，他显示了可贵的忍耐力和高度的政治热情；在过去的20年里，他一直是中国问题的专家。但是，当他驱车前往总统府驰过台北路时，又一次意识到自己对于眼前这个世界，还像刚刚从哈佛毕业时那样，实在是所知甚少。街头小贩、手推车、三轮、牛车和少量红色达特森出租汽车从他的车窗外一一闪过，他突然有一种沧海桑田、今非昔比的感慨。回想过去一连串令人啧舌的成功，真像是一些不可思议的奇迹。

1961年2月，台湾国民党流亡政府迎来了它的第二个十年。这次，他是作为斯察特·约翰·肯尼迪的特使露面的。

肯尼迪本星期将宣誓就任美国第三十五届总统。整个上午，斯蒂文斯一直在同狐疑多变又异常固执的国民党政府官员交涉，他拼命向他们肯定新政府对台政策将不会改变，然而收效甚微。现在，他正要去向蒋介石元帅的总参作更为明确的保证。形势相当微妙，刚才上车时，一位副手递给他一份译好的紧急外交电文：

情报处获悉：总统就职宣誓周将有大规模反美示威活动，目的是使新的民主党政府陷于窘境。希进一步调查核实，并拟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

斯蒂文斯被这一阴谋难住了。像这样的示威游行似乎太不可能了。台湾是全球冷战最为重要的一个战略要点。共产党中国近在咫尺之遥，就在斯蒂文斯为目前的困境苦思冥想之际，金门、马祖二岛正饱受着共产党福建军区炮兵部队的狂轰滥炸呢。这个岛屿要塞上的人们都统统被牵扯进国际反共联盟里来了，企图使他们是亲密的盟友丢面子的任何举动难道不是一种自杀行为吗？

然而，斯蒂文斯并不敢怀疑这条消息的准确性和重要性。他是美国国务院最高级台湾问题专家，自从国民党在这个岛上建立据点，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保证国民党偏安一隅之后，他来这儿已经不下百次了。他对蒋介石流亡政府的没有定见和缺乏远虑早已司空见惯了，他知道它是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的——特别是涉及面子问题时——他们本来就不准备把面子当一回事儿。

他同样清楚这个政府同城市底层黑社会的联系是如何繁

密，突然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对它来说并非难事。事实上，四年以前，美国驻台使馆在国民党精心策划的全面反美骚乱中就曾遭到过小股打手队的严重骚扰。他摆脱不了这个恼人的念头：类似这样的事件很可能在这个星期发生，尤其因为蒋介石对参议员肯尼迪竞选前景非常担忧以至一度曾为尼克松先生奔走效劳……

轿车驰进市中心，斯蒂文斯看到一大群人聚集在红砖砌成的富丽堂皇的总统官邸周围。司机在安全线内停下，一个板着脸的持枪卫兵上前为他迅速打开车门。这位副司长跨出轿车，伸直足足6英尺的身子，这时他发现聚集在这儿的人数比刚才估计的还要多，虽然秩序井然，可大多数人脸上表现出愤怒的神色和明显的敌意。

当斯蒂文斯迟疑地走向大门台阶时，眼前的情景使他不寒而栗。在人群外围至少有10到15个身穿蓝布上装满脸杀气的中国人。他一看就知道这是蓝衣社——恶声四溢的青帮别动队——显然，他们在这儿伺机闹事。这些人手持棍棒，举着写有“反共”、“反肯尼迪”、“支持尼克松”的标语牌。

他还没有反应过来，额头早挨了一记；他向后趔趄几步，跟着是一阵石块、沿脚水和污水袭来。一小队中国警察慌忙把他和群众隔离开来，两名特工人员费力地挽着这个高大的美国人的胳膊，把他拉上台阶，拖进大楼。

斯蒂文斯刚一摇头，就感到血从额头的伤口渗出来。他的中方联络官扶他在椅子上坐下，他的手明显地颤抖着。

“外面……怎么回事？”

年轻的中国少校，脸色铁青，神情沮丧，温顺地低头看

着斯蒂文斯脚下的地板，“我不知道，先生。”

斯蒂文斯抓住他的胳膊，怒不可遏，真想揍他一顿，“这只是个开头，对吗？你们这些狗杂种想制造一场大骚乱！这将是又一个1958年！”

“啊不，先生。”上校说道，差不多要哭了，“不，不。”

斯蒂文斯放开他的胳膊。他现在认定他的使命肯定要被中国人傲慢无礼的举动宣布无效，种种外交倡议、政治压力或者高层斡旋都为时已晚。到了这种地步，他只有一种选择，不过，这得靠一个叫怀特的美国青年帮忙了。

美国海军中校弗罗德·哈里斯，台北宪兵总部的主任参谋，坐在台湾国防司令部柚木长桌的一端，紧皱双眉，一筹莫展。

他是个短小精悍的安纳波利斯人（他在学校里有个受人讥笑的绰号“树桩”），祖父、父亲都是海军军官。他以前是运输机飞行员，在朝鲜因作战勇猛而两次立功。现在他要对付的是一个特别紧急的情况。前天，一帮主要由美国青少年组成的号称“军阀”的团伙在商业区横冲直撞，骚扰生事，破坏斗殴的严重程度已由当天的英文报纸披露出来。外国通讯社对这条消息很可能抓住不放。这事发生在总统宣誓就职周，会使美国在西方人面前丢脸的。

与哈里斯同桌的，是组成台北美国人社会口集团的头头脑脑，有教会、商务、外交以及1954年美国和国民党《共同防卫条约》签署后来台湾的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的三个分部。整个上午哈里斯都是耐着性子坐在那里，听他们各抒高

见，分析为什么会发生如此骇人听闻的事件；为什么在过去11年的多灾多难中建立起来的这个完美理想的美国小社会，在为自己已经形成的一种具体而微的传统的美国风习庆幸自豪的时候，竟会突然冒出一个什么青少年团伙……会议室里的每一个人都绞尽脑汁，但看来种种推测都无济于事。

哈里斯旁边，红脸教士沃纳正以低沉庄重的语调哀叹道：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台北这座城市也有我们过去在上海时不得不对付的种种邪恶。这儿有比当今亚洲其他城市更多的娼妓、更多的下流酒吧、更多的闹事机会、更高的犯罪率。孩子们只要离开外国领地，到城里其他地方随便逛逛，就一定会不断受到这儿无处不在的盗贼风气的影响。这才是我们真正面临的问题。”

问题！天晓得，他来台湾才六个月，类似的问题不知有多少人在他面前谈论过了。真正的问题，是那些小家伙们有大量牟利的机会；他们用类似那种曾经把西方人的注意力吸引到中国来的资本主义激情和冲动将这些机会牢牢抓住，孜孜以求。蒋介石在整个美国人社会范围内实行外交豁免，中国警察管不了他们，这样一来，问题就更加严重了。在过去的10年里，这个理想的小社会的孩子们已经结成了一个异常复杂的少年犯罪团伙，成员包括将军和上将的儿子、资深位显的外籍官员的儿子、大公司行政官员的儿子、甚至还有传教士的儿子。他们中间有些人在这个城市其势炎炎，神通广大。他们广有资财，参加体面的上层社交活动，倒卖军用物资，贿赂公职人员，甚至和中国下层黑社会做生意。作为新成立的对付少年犯罪的机关的头头，哈里斯的工作就是控制

这些犯罪团伙。这个“军阀”不过是众多团伙中的一个，它首先挑起事端，既是对他的羞辱，也是对他在海军中的地位的严重威胁。

哈里斯用一只异常粗壮的手慢条斯理地点燃一支香烟。他凝视着窗外一排棕榈树，宽宽的树叶在午后的微风中轻轻摇曳。他真希望自己在别的什么地方，随便什么地方都行。过了一会儿，冗长沉闷的会议终于有了个了局，哈里斯插话了：“好吧，我已了解了各位对这个事件的看法，我相信大家对此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我希望大家全力以赴对这批小流氓采取强硬措施，保证类似事件不再发生。”

他说得很自信，但他自己也知道这些话空洞无力，说了等于没说，他意识到在座的人一定很清楚，对这种烦人的事他们是无能为力的。要控制“军阀”帮挑起的事端，不让它蔓延开来，他所能做的，恐怕只有用某种东西，比如社会良心什么的，去感化、说服在台北的另一个美国青少年团伙。他将不得不去欧米加·凯，与他们的头领布赖恩·怀特，举行另外一次会谈。

大卫·巴特勒，美联社驻东南亚的新任流动通讯员，猛地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他意识到，他遇上了一个令人十分头疼而又后果严重的问题。

巴特勒是个有才华有抱负的青年记者，但初出茅庐，还缺乏必要的经验。他想在台北搜集材料，总结一下十年来国民党在这个岛上的政绩。昨天晚上，他来台湾的第一夜，与一个叫苏茜的娇小活泼的台湾酒吧女共度良宵。她是他从数以千计的那种无名小酒吧里勾搭来的，这些酒吧是这个城市

的污秽所在，美国人都把它们称作“罪恶小巷”。他带她回旅馆，尝尽了一夜异国情调的云雨之欢。她有着导游指南所描述的种种妙处，大概是他一生中碰到的最热情最够味儿的可人了。然而一觉醒来，记者戴上眼镜，狂乱地搜查房间，发现无论是姑娘还是他装有护照、旅行支票、重要文件以及花了一个月才从在东京的上司那里弄到手的派遣证的公文包，全都不翼而飞了！

他匆匆喝了口酒，咒骂着，穿好衣服，在台北棕榈成行的林荫大道上跑了一段路，来到警察局办公大楼，在一个立有“申诉”牌子的柜台前，他向一名从贝特曼的一本喜剧小说上抬起头来的粗脖子的值日刑警解释他遭遇到的倒楣事。

“您知道，”巴特勒急切地诉说道：“我工作所需的一切东西都在那个公文包里了。如果找不到它，我可真是走投无路了。我是说连一点退路也没有了。我现在还只是试用期，您明白吗？一定要帮帮我啊！”

刑警递给他一叠表格，要他一式三份填写。他脸上有种难以遮掩的高兴，显然是在幸灾乐祸：“您这可是在白费时间，我的朋友。这个城市的婊子肯定不下一万，叫苏茜的就有一半。单是护照，黑市能卖1000块钱。您填上表，再把自己搞得精疲力竭，到头来还是找不到您的那个公文包。”

巴特勒把表格留在柜台上，向他借用电话。他要给城里一个熟人拨个电话。这人能说一口不太地道的汉语，还是几大外国通讯社在当地的主要消息来源。虽然把握不大，却是巴特勒此时唯一能够想到的一根救命稻草。

“唔，这可不妙啊。”这位熟人在电话里说：“无论怎样，你可别指望那些公安部门或中国警察帮忙。据我所知，